

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童恩正

如果我们站在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纵目遥望祖国大地，就会发现在高原的东北，有几道山脉连续地向东延伸，这就是青海的祁连山脉，宁夏的贺兰山脉，内蒙的阴山山脉，直至辽宁、吉林境内的大兴安岭。而在高原的西南部，也有几道山脉向南延伸，这就是由四川西部通向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这一北一南的两列山峰及其邻近的高地，在地理上如同一双有力的臂膀，屏障着祖国的腹心地区——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肥沃的平原和盆地；在文化上，这一地带则自有其渊源，带有显著的特色，构成了古代华夏文明的边缘地带。

尽管这一高地绵延万里，从东北至西南成一半月形环绕着中原大地，但是从新石器时代后期直至铜器时代，活动于这一区域之内的为数众多的民族却留下了若干共同的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的相似之处是如此的明显，以至难以全部用“偶合”来解释。因此，我们如果能从头绪纷繁的文化现象中分析出这些共同之点，并且进而探讨产生这些共同性的原因，当有助于我们对于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认识，增加我们对于古代边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了解。

所谓考古学文化，是需要通过一定数量并具有一定特征的物质遗留来体现的。它既包括了人类制造的器物(生产工具、生活用具、装饰品等)、建筑(房屋、墓葬、宗教设施等)或其他遗迹(人类活动留下的痕迹，动植物遗留)，同时也包括了这些遗物或遗迹上的某些特质，如制造技术、装饰风格、原材料选择、习惯措施等。此种构成某一考古学文化的基本因素，我们可以称之为“文化因素”(Culture Element)^{【1】}。不论每一文化因素的性质如何，但均有一共同特点，即它们都是通过物质来显示的。我们一般对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实质上乃是对这些文化因素进行对比研究。文化因素之间的相似性愈多，则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愈加密切。个别的或少数的文化因素的相似，可以用不同地区在相似环境下独立发明来解释，但是如果相似的因素比较多，并且是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反复出现，我们就需要从其他方面来考察其原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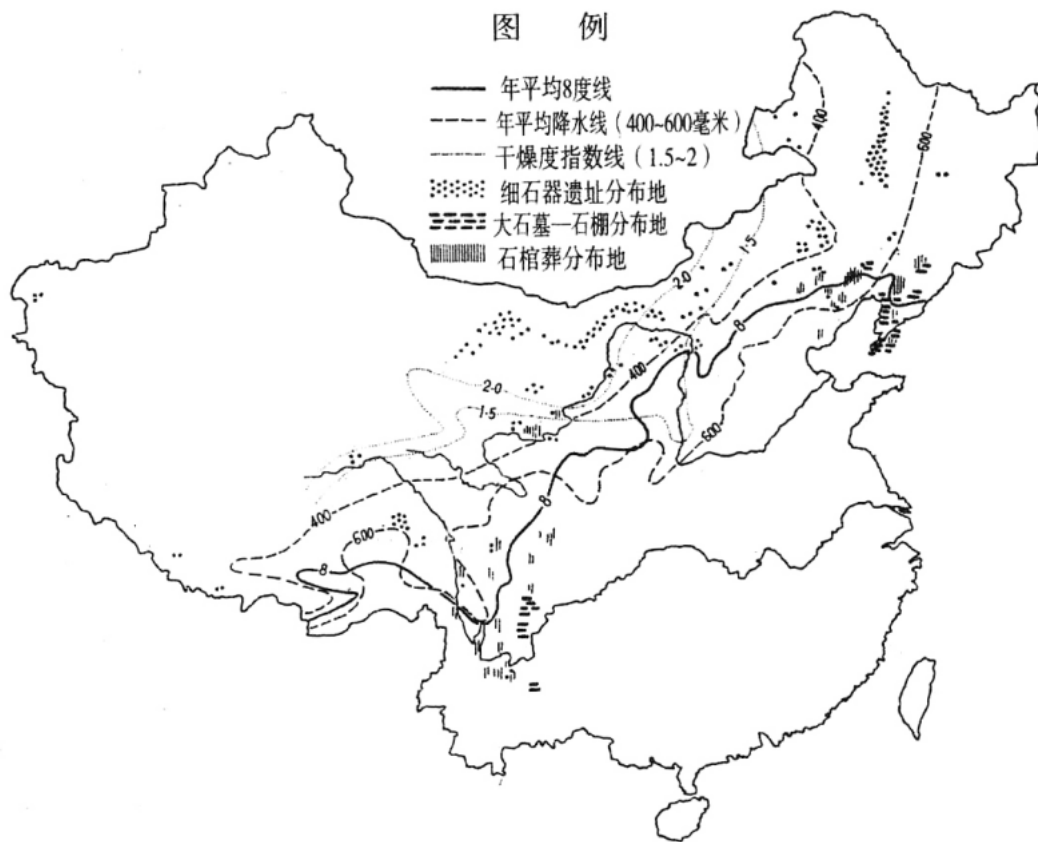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们即是从文化因素的对比入手，探讨从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中国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存在及其产生的规律。

一 细石器

我国细石的分布，大致可以分为北、西两线。北线起自东北，沿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而西。佟柱臣先生曾将北方和东北的细石器分为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区、河套地区、巴丹吉林沙漠地区、浑善达克沙漠地区、呼伦贝尔草原地区、松嫩平原地区^{【2】}。西线见于黄河上游兰州雁儿湾马家窑文化遗址^{【3】}、景泰张家台半山类型文化墓地^{【4】}、酒泉下河清马厂类型文化遗址和永昌鸳鸯池墓地^{【5】}以及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遗址^{【6】}。由此而南，细石器在青藏高原有着广泛的分布。见于报道的地点有黑河、托托河沿(海拔4300米)^{【7】}聂拉木县亚里村(海拔4300米)、羊圈(海拔4900米)^{【8】}，双湖县玛尼、绥绍拉西侧、绥绍拉西北、色乌岗东北，申扎县珠洛勒、卢令、罗马松、加吓日阿嘎、捧康、改扎、雄梅、不金雄、亚司、查勒多、洛扎、巴家、东乡、尼隆(以上地点海拔为4500—5200米)^{【9】}，普兰县马法木湖东北岸(海拔4630米)，日土县帕也曲真沟北岸(海拔5200米)，吉隆县戳错龙湖西北岸(海拔4620米)^{【10】}。经过科学发掘的含细石器的遗址则有四川蘼霍甲洛呷妥(海拔3800米)^{【11】}，以及西藏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海拔3100米)^{【12】}。在西南地区发现细石器的最南地点，是云南的元谋盆地^{【13】}(图1)。

北线和西线的细石器具有若干共同之点，如均不见几何形细石器，均有楔形石核、船底形石核、锥状石核和柱形石核，有相应的从上述石核上剥离下来的细石片和细石叶，器形有刮削器、尖状器、刀片、箭镞等，这些均属于我国华北细石器工艺传统^{【14】}。不过西藏的细石器，仍然带有某些地方特点，如其中所出的带侧翼的圆锥形石核和棱柱状石核、半圆锥形石核和柱状石核、漏斗形石核刮器、弧底三角形圆刮器、隆脊宽刃短刮器、利用细石片制的长刮器等，这些均少见于其他的地区。但是这些变异(variety)，主要应视为时代的差异，而非系统的不同。就严格的科学意义来讲，细石器都应该是用间接打

击法产生的，但我国的细石器中亦包括了部分用锤击法或砸击法产生



**图 1 细石器、大石墓—石棚、石棺的分布
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示意图**

的石片石器或石核石器，仅仅由于其体积细小，故一般研究者仍将它归纳入细石器之中。

佟柱臣先生指出：“在我国这样实际情况下，细石器到底代表个什么概念呢？我以为它是在我国的草原沙漠地区以及与其邻接的地带，在有石英、玛瑙、石髓、燧石等石材的条件下，一定技法一定形式，而反映在工具上的一种含义。”^{【15】}这种将细石器的产生与一定的生态环境相联系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南方的细石器，主要集中于西藏，发现细石器的地点海拔均在三千米以上，多属高山灌丛草原区，其自然环境接近北方草原沙漠地区；强烈的新构造运动引起的高原的隆起，河流的下切侵蚀，冰川的搬运，使本地区基岩大面积裸露，石英、玛瑙、石髓、燧石等石材易得，故而具备产生细石器的条件。

细石器是经常作为一种复合工具而使用的，所以镶嵌石刃的骨刀梗，亦见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地带之内，如黑龙江昂昂溪遗址^{【16】}、内蒙古富河沟门遗址^{【17】}以及甘肃永昌鸳鸯池^{【18】}、景泰张家台^{【19】}、青海西宁朱家寨^{【20】}等地。它们与细石器一起，构成了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重要的共同因素。

二 石棺葬

石棺是我国古代边地民族常见的一种葬具，它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后期，延续至铁器时代；但其鼎盛时期，却在铜器时代。此种文化因素，虽然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文化所共有，不能用“石棺葬文化”来概括，但其形制的演变和分布的规律，仍然可以给予我们很多启示。

就形制而言，石棺葬又可分为石盖土坑墓、石盖积石墓、石盖石棺墓三类，但由于其文化内涵相同，且有时在同一墓地出现，所以我们仍以石棺葬统名之(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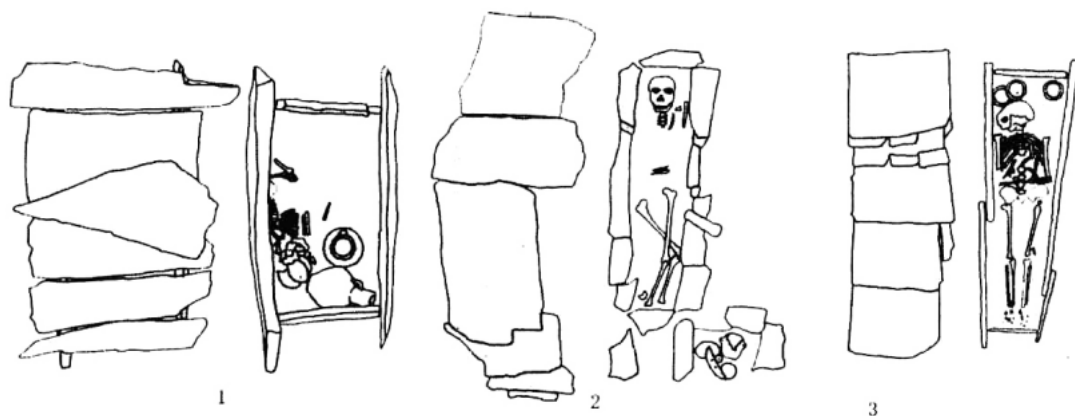


图2 石棺结构比较图

1. 景泰张家台 M1; 2. 吉林西团山 M8; 3. 茂汶营盘山 M9

中国有关石棺的最早记载，见于《史记·秦本纪》：“是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但考古学上石棺葬最初出现的雏形，可能是属于仰韶文化的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458号墓，该墓“穴底有二层台，台上堆砌数层砾石，形成石棺”^{【21】}。其次是属于陕西龙山文化的神木县石峁墓地，其结构“是在坑底和四壁衬铺石板，上面再盖上石板成棺材状(石板是根据石头的自然层理，经敲砸而得)”^{【22】}。在西北地区，则见于景泰张家台墓地，在清理的二十二座墓葬中，有石棺墓十一座，不但数量多，而且形制固定，已经是长方形有底有盖的规整石棺了^{【23】}。

进入铜器时代以后，石棺葬发展成为我国北部和西部边地民族普遍的葬式。其分布仍然是从东北开始，沿华北的北部边缘(大致以长城为界)向西，在甘青地区折向西南，经青藏高原东部直达云南西北部的横断山脉地区，而大致与前一历史时期细石器的分布地带相重合。

在此广袤的地域之内，石棺葬又有地区的差别。每一局部地区的石棺葬均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不同的民族集团相联系。

在东北地区，石棺葬的分布可以分为四个亚区。

第一个亚区在吉林省境内，从威虎岭以西至东辽河流域。见于报道的墓葬地点有吉林西团山^{【24】}、骚达沟^{【25】}、小团山、东梁岗^{【26】}，永吉旺起屯^{【27】}，江北土城子^{【28】}，蛟河山头屯、小南沟^{【29】}，永吉星星哨水库^{【30】}，吉林长蛇山^{【31】}、猴石山^{【32】}等，均属于西团山文化，其时代约从西周至战国，一般学者均认为这是古代肃慎族的遗留^{【33】}。

第二个亚区在辽宁省西部，即辽河以西的西拉木伦河、英金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诸流域。见于报道的石棺葬有赤峰红山^{【34】}、宁城南山根^{【35】}、喀左南洞沟^{【36】}以及朝阳十二台营子^{【37】}等地。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范畴，其时代约为西周早期至战国中期，可能是属于古代东胡族的遗留^{【38】}。

第三个亚区在河北省北部，从七老图山至云雾山一线，包括燕山山地及滦河流域在内。发现石棺葬的地点有丰宁皮匠沟^{【39】}、围场东家营子^{【40】}、平泉东南沟^{【41】}、唐山^{【42】}等地。其时代约从西周早期至春秋晚期，有人推测这是周代山戎的文化^{【43】}。

第四个亚区在辽宁省辽河以东的区域，向南包括辽东半岛在内。发现地点有抚顺大伙房^{【44】}，辽阳二道河子^{【45】}，清原县门脸^{【46】}

、土口子中学^{【47】}，辽阳市接官厅^{【48】}以及新金县安波公社^{【49】}等地。这类石棺葬随葬器物有方釜扇形铜斧(或斧范)、凿、小刀、横耳圆腹陶罐等，而以一种有圆柱状的茎与脊、刃成曲线的青铜短剑为其特征，时代约在春秋，论者以为属东夷族系^{【50】}。

在黄河上游，属于铜器时代的石棺葬发现较少，但近年来在青海民和县簸箕掌、山城台、瓦窑台、郭家台、原土台等地发现了一批石棺葬^{【51】}，属于辛店文化甲组遗存，其时代在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估计今后在甘肃西南部和青海东部还会有类似的发现。这一发现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首次证明了在黄河上游的古代民族中，有一支是有采用石棺葬的习惯的，这就提供了解决南方西藏、四川石棺葬的来龙去脉的线索。关于这批石棺葬的族属，俞伟超教授曾经指出：“根据卡约、寺洼及辛店的分布区域，就知道它们是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的遗存。”^{【52】}俞伟超教授谈道“以羌人为主体的西戎诸部落”而不肯定他们全部是羌人，这是十分审慎而正确的。因为在甘肃中南部地区后代泛称的羌族中，有一支实即从战国到西汉见于历史的氏族。

《三国志·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西戎传》，追述氏族的历史时说：“此盖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獯道者也，今虽都统于郡国，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间。”按汉之街泉在今甘肃秦安县，冀县在今甘谷县，獯道在今陇西县，均在泾渭二水上游之间。《后汉书·西羌传》载：“景帝时，(羌)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县。”据《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有蛮夷曰道”，此处之氐道，当指先秦时氐人聚居的地区，其地在今甘肃南部西汉水上游一带。足见氐人虽然长期与羌人杂居，在西周时同以“西戎”一名而见于历史，但是他们自有其传统和独特的文化，在汉世的区别还是很清楚的。关于甘肃南部之氐，西汉前期司马迁写《史记·西南夷列传》时还能确凿的辨明：“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但到五百余年后南朝宋范曄写《后汉书·西羌传》时，记载这一支氏族，就说“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又将之混入了羌的系统。考虑到西北能明确定为羌族文化者均不见石棺葬(如东部的齐家文化，西部的火烧沟类型文化)，则留下石棺葬的民族是属于氏族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在青海境内，石棺葬的分布折向南方，而盛行于青藏高原之东部，包括了四川的川西高原、西藏的藏东高山峡谷区和云南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在此区域之内，亦可分为四个亚区。

第一个亚区位于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岷江上游，发现地点有汶川县萝卜寨、大布瓦寨，理县于达寨、龙袍寨^{【53】}、佳山寨^{【54】}，茂汶城关^{【55】}、营盘山^{【56】}、撮箕山，桌子坝，西清地、上南庄^{【57】}等地。这批墓葬的时代早者为春秋，晚者可达西汉末年，其族属据我管见，当为冉駹夷中，“六夷、七羌、九氐”中之氐族^{【58】}。

第二个亚区在大渡河——青衣江流域。发现的地点有宝兴瓦西沟口^{【59】}、陇东老场桥头^{【60】}、汉源大窑^{【61】}等地。大窑石棺葬不出双耳罐，但出一种单口双联罐，形制古朴，陶质疏松，原报告定在秦汉之际，实际上恐不会晚于战国。陇东石棺葬有用东汉砖砌棺壁之现象，又出土了货泉，其为东汉遗留无疑。

在西汉时，今宝兴为青衣县。《水经注》卷三六：“青衣水出青

水县西蒙山，东与沫水合也”，注曰：“县，故青衣羌国也。”可见其主要居民为羌族。汉源县为旄牛县，《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至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此处之徼外夷，无疑应包括《后汉书·西羌传》中列举之“或为犛牛种，越嶲羌是也”之羌族，按旄、犛同字异写，旄牛县之得名，当由于该地之犛牛种羌人，足证这一带的居民主要为羌族。直至唐代，这里的居民成分变化仍然不大。《旧唐书·地理志》记“雅州”：“都督一十九州，并生羌、生獠羁縻州”，可见羌族仍为主要居民集团之一。所以我们推测，这一亚区的石棺葬可能与传说中的青衣羌、犛牛羌有关。

第三个亚区在金沙江——雅砻江流域。发现的地点有炉霍甲洛呷妥^{【62】}，雅江呷拉^{【63】}，木里麦地隆公社^{【64】}，盐边渔门、永兴、惠民等区^{【65】}，巴塘扎金顶^{【66】}等地。其中扎金顶 M4 木棺的¹⁴C 测定年代为公元前 1285 年(经树轮校正)^{【67】}

，约当商代后期。甲洛呷妥石棺葬出大量细石器、骨器，不见川滇地区石棺葬的典型器物——双大耳罐和缠纛状柄山字格铜剑，这可能是其时代较早的一种表现，估计其时代亦可能在商周之际。呷拉的石棺葬则可能在战国晚期。至于木里和盐边的石棺葬，由于目前资料太少，还难以断定。这一地区的民族关系非常复杂，在汉代仍被称为“徼外蛮夷”，所谓“自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68】}。仅《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及《张王种陈列传》所载即有箬都、白狼、槃木、唐菽、楼薄、汗衍等“百余国”。“其人皆被发左衽，言语多好譬类，居处略与汶山夷同。”^{【69】}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后汉书》是将这些民族均附于箬都夷一节中叙述的，足见其大的族系相同。目前我们仅能推测康定以西的雅江、巴塘一线的石棺葬可能和白狼有关^{【70】}；而雅砻江下游木里、盐边一带的石棺葬则可能和箬都夷有关^{【71】}。不过他们都是属于大的氐羌族系，恐怕是没有问题的。

第四个亚区在滇西北横断山高山峡谷区。这里的石棺葬可视为金沙江——雅砻江亚区石棺葬文化向南的延续，故二者的关系相当紧密。目前发现的地点有德钦永芝^{【72】}、纳古^{【73】}，丽江大具、金江、石鼓、巨甸、桃花、红岩、格子、古渡、马鞍山^{【74】}，永仁菜园子^{【75】}、维的^{【76】}，祥云检村^{【77】}，元谋大墩子、下棋柳^{【78】}，姚安黄牛山^{【79】}等地。

这批墓葬的时代，早者如永仁菜园子、维的、元谋大墩子，可达商代(本地可能还是新石器时代)；晚者如祥云检村的石棺墓，则可以到西汉前期。关于此亚区石棺葬的族属，可能仍然是箬系民族，大致相当于汉代的嵩、昆明^{【80】}，魏晋时的摩沙夷^{【81】}，唐代的施蛮、顺蛮、磨蛮、磨些蛮^{【82】}，以及徙莫祗蛮和俭望蛮^{【83】}之属。

就现有资料而言，发现的石棺葬以西北地区最早，西南次之，东北又次之。这三个大区虽然相隔甚远，但石棺的结构却惊人的相似。我们似有理由可以推测，石棺原为黄河上游某一氐羌系统的民族(其中以氐族的可能性较大)所采用的一种葬具，以后才传播到“西南夷”和东北的“胡”、“戎”诸民族中去的。

三 大石墓——石棚

大石墓或称石棚，其基本结构是以巨石树立做四壁，顶部再覆以大石，构成方形或长方形墓穴。这类墓葬多半是一种氏族的丛葬墓，且常与二次葬相联系，如待死者肌肉腐朽后拾骨入葬，或者火化后将骨灰放入。另有一种则以大小不一的石块砌成四壁，以石板盖顶，且有分隔为数室者。此种墓之规模较石棺葬为大，有人称之为积石墓，故亦列入本节讨论。

大石墓——石棚在我国之分布，恰与石棺葬一样，仍然是集中在两大地区，即东北与西南。在东北，大石墓——石棚比较集中发现于辽宁省之东部，在盖县、复县^{【84】}、旅大市、金县、庄河县、岫岩县、营口县、海城县、清原县、新宾县^{【85】}、开原县^{【86】}等地均有分布。积石墓则见于辽宁阜新县胡头沟^{【87】}、旅顺老铁山、营城子公社、双岛公社、长海县蛤仙岛^{【88】}以及大连于家村砬头^{【89】}等地。

关于此类墓葬之时代，积石墓出土遗物呈现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风貌，约当中原之商末周初；而大石墓——石棚则多为春秋战国时代的遗存。一般论者认为其创造的民族可能和大肃慎族系有关。

在西南，类似之墓葬主要集中于四川西南部凉山彝族自治州之安宁河流域以及与之毗邻的云南省金沙江以南之地，在安宁河流域，先后在越西、冕宁、喜德、普格、西昌、德昌、米易等县发现了大石墓——石棚近百座^{【90】}，经正式发掘的地点有：西昌坝河堡子^{【91】}、河西公社^{【92】}、西郊公社^{【93】}、礼州公社^{【94】}，冕宁三块石^{【95】}，德昌五一公社^{【96】}，喜德拉克公社^{【97】}，米易挂榜公社^{【98】}等地。这批大石墓的时代，其上限可达春秋，下限至于东汉，笔者认为是古代邛都夷的遗存。

在云南境内金沙江以南的地区，大石墓——石棚有确切材料报道者有两处，其中弥渡县苴力清理的十座属于大石墓^{【99】}，而祥云县检村 M1 为多室积石墓^{【100】}。两处墓葬的时代均为战国。其族属笔者认为可能属于洱海地区与滇族关系密切的一种农业民族，或与牂榆、靡非之属有关^{【101】}。

在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之间，迄今并未发现大石墓——石棚，这也就是说，缺乏传播的中间环节，所以其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们目前不能加以附会。但是两地之间在墓葬结构和葬式方面的这种相似，

却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

在此还想附带讨论一下火葬的问题。此种葬俗出现于新石器时代末期，它普遍发现于辽宁南部的石棚和石棺墓中，在内蒙古昭乌达盟石棚山氏族墓地、甘肃寺洼文化墓葬中亦有发现^{【102】}，而在西南地区四川岷江上游石棺葬中，火化骨殖再用石棺埋藏的现象也是常见的。此种葬俗曾被内地民族视为怪异，认为不合“仁义之道”^{【103】}，但在本文所讨论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之内，它的分布却是相当广泛的。

四 石头建筑遗迹

古代某些民族之所以兴建石棺葬，大石墓——石棚这一形式的墓葬，其最本质的原因，还在于人们在生产和生活的实践中，对于石质建筑有所熟悉，有所应用，最后才能产生宗教信仰上的观念。根据古人事死如事生的习惯，为死者兴建的幽宅，往往模仿生前的住宅，所以石质坟墓的出现，亦与其地的实用建筑有关。

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居住习惯，从最早的属于磁山——裴李岗文化的河南莪沟遗址的房屋开始，就是一种半地穴式房屋，而且以后历经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而无变化^{【104】}，在长江流域，人们则习惯居住干栏式建筑，从最早的河姆渡文化即是如此^{【105】}，其后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浜文化、良渚文化等虽发展了一种地面竹木结构的房屋，但与此同时仍保留了干栏式房屋的传统^{【106】}。唯有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存在着一种石头建筑的遗存。它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这一地带文化因素的某些共同性。

在青藏高原东部盛行石棺葬的区域之中，石建筑具有古老的传统。《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冉駹夷：“皆依山居止，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隋书·附国传》记附国人：“……垒石为磧而居，……其磧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磧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此种建筑，唐代称之为“雕”或“𡵚

舍”，遗风至今犹存。现在西藏东部、四川甘孜、阿坝两藏族自治州的藏、羌、嘉戎诸族人民的房屋，仍然保存了石砌的传统。在昌都卡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其晚期建筑全部是半地穴式石墙房屋【107】，类似的用石块砌墙的半地穴住屋遗迹还见于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赤峰蜘蛛山遗址 F4 和 F5【108】、药王庙遗址 F1【109】，属于西团山文化的吉林泡子沿前山遗址房屋 F1—F4【110】、长蛇山遗址房屋【111】及猴石山遗址房屋【112】等(图 3)。

除此以外，卡若遗址还发现了石墙基、圆石台、石围圈【113】等建筑遗迹。其中圆石台、石围圈等可能和原始宗教信仰有关，在全国其他原始文化中并不多见。但在属于红山文化的辽宁喀左县东山嘴遗址中，却发现了与之类似的石墙基、石圈形台址、多圆形石基址等遗迹【114】。在阜新县胡头沟，也发现了石围圈遗迹【115】。这种通过类似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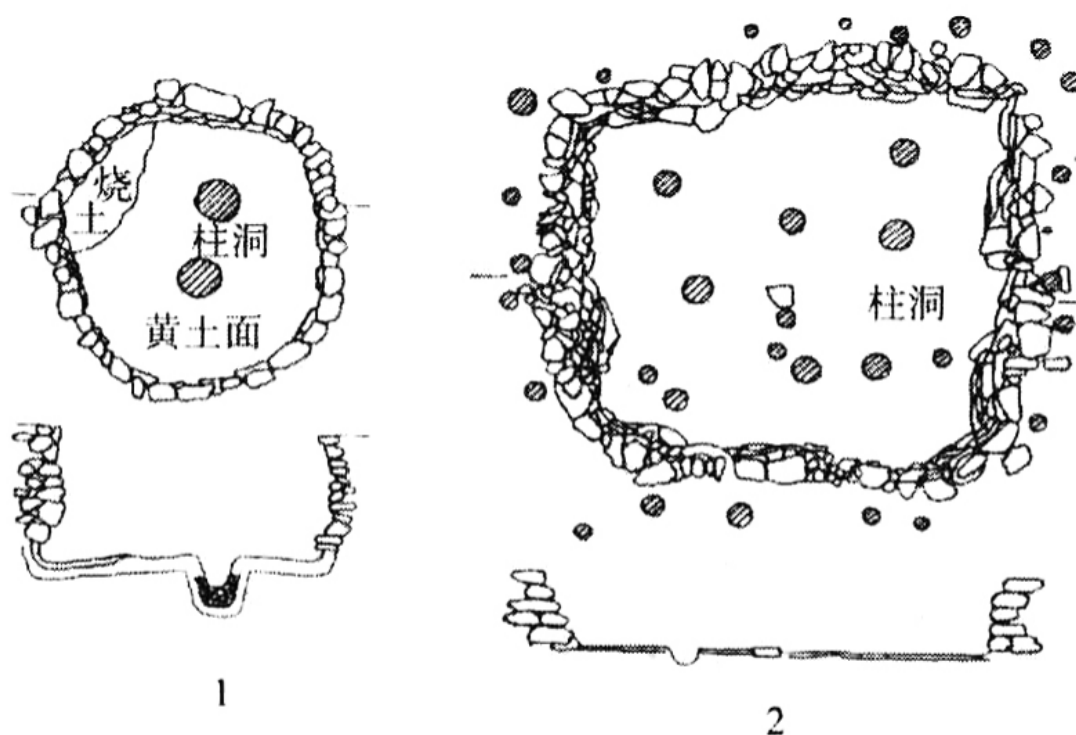


图 3 石头建筑房屋遗存

1. 药王庙 F1；2. 卡若 F12

建筑遗存而反映出来的意识形态中的某些一致性，同样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

五 其他文化遺物

在东北和西南之间，除了建筑、葬式和墓葬结构等方面的相似以外，两地遗址及墓葬中所出文化遗物，也存在着若干联系。由于这些联系往往是以个别因素出现，所以长期以来，学术界并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查从新石器时代到铜器时代中国边地文化的全部内容，则我们可以发现此种联系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

在我国的东北和西南地区，均出一种两面有凹窝的球状石器和圆形穿孔石器，尽管各地命名不同，但其大小形状则相去不远。如卡若遗址所出Ⅲ型研磨器^{【116】}及Ⅲ型重石^{【117】}实即夏家店下层文化所出球形石器^{【118】}（图4）；卡若遗址之Ⅰ型重石^{【119】}即夏家店下层文化之穿孔石器^{【120】}，上层文化之环形器^{【121】}（图5）。类似的器物还见于内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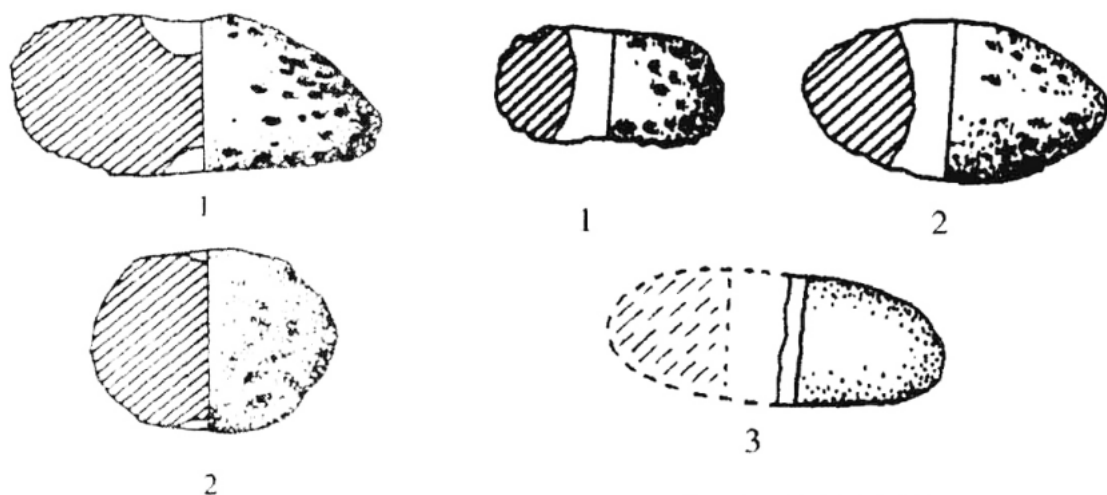


图4 球形石器

1. 卡若；2. 夏家店下层文化

图5 穿孔石器

1. 卡若；2. 夏家店上层文化；

3. 夏家店下层化

古林西^{【122】}、吉林永吉杨屯^{【123】}及舒兰黄鱼圈珠山^{【124】}等处。所谓球形石器，可能是用作投掷的工具；而穿孔石器，则可能安装短柄用以砍砸^{【125】}，这二者都是与狩猎的经济活动有关的。

在西南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具有特征性的器物之一就是—种单孔或双孔的半月形石刀，刃开在弯曲的弓背的一侧。1939年，考古界前辈吴金鼎、曾昭燏等人在云南大理发掘时，即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指出：此次在苍洱境发现之史前文化，其本质颇异于华北之仰韶龙山两文化。虽与华北文化不无关系，而地方色彩甚重。最显著之特点，即断线压文与半月形石刀。断线压文陶在华北少见，今日所知者，只甘肃及热河有之，而在苍洱境则极为发达，占饰文陶之一重要部分。半月形石刀开刃法，苍洱与华北不同。以弓为喻，华北刀刃开于弓弦，苍洱境所出者刃开于弓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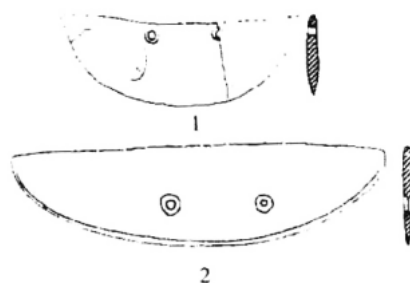


图6 双孔半月形石刀

元谋大墩子；2. 吉林西团山

在应用上，华北式适于割，苍洱式适于切^{【126】}。此处吴、曾两氏虽未明言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问题，但却意识到了边地文化与华北文化之间的两项区别，这无疑是正确的。此类石刀以后在四川西昌礼州遗址^{【127】}、云南元谋大墩子遗址^{【128】}、宾川白羊村遗址^{【129】}、昌都卡若遗址^{【130】}等地均有发现，但它同时又是东北西团山文化石棺葬中出土的典型器物之一，见于吉林西团山^{【131】}、小团山、东梁岗^{【132】}，长蛇山^{【133】}，永吉星星哨^{【134】}、杨屯^{【135】}，舒兰黄鱼圈珠山^{【136】}等地（图6）。就其时代来看，是西南早而东北迟，其间自不能排斥由南到北文化传播的可能性。

青藏高原东南部新石器时代另一特征器物就是一种长宽比值很大的条形石斧或石锛，它见于西藏昌都卡若遗址^{【137】}，四川汶川、理县^{【138】}，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139】}等地。而在黄河上游，则见于甘肃兰州西坡^{【140】}和东乡^{【141】}马家窑文化遗址、武威皇娘娘台齐家文化

遗址^{【142】}，青海民和县核桃庄马厂类型遗址^{【143】}。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北它又常见于西团山文化之中，如吉林长蛇山石棺葬^{【144】}、泡子沿前山石棺葬^{【145】}，珲春——松亭遗址^{【146】}

等，此外在辽宁本溪县庙后山洞穴墓地亦有出土^{【147】}。

进入铜器时代以后，这一地带之间相同的文化因素更加显著。即以铸铜技术而言，在我国中原地区，铜器时代的早期虽曾使用过石范，但至少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开始(约公元前 1900—公元前 1600 年)，其青铜铸造业主要就是使用陶范^{【148】}。以后历商周而下，直至铸铁业开始，情况仍是如此。但在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之内，铸造技术似乎是循着另外一种传统发展，这就是铸造简单的工具或兵器时用石范，而铸造较复杂的容器或装饰品时用失腊铸造法。

在亚洲地区，迄今所知最早的石范，是泰国东北能诺他遗址第四层出土之两对砂石斧范，其时代约在公元前 2100 年^{【149】}。以后较多的发现于中南半岛其他较迟的青铜时代遗址中^{【150】}。在我国西南地区，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曾发现过片麻岩制成的斧范^{【151】}(¹⁴C 测定时代距今 3115±90 年)，剑川沙溪墓葬中出土过钺范^{【152】}，四川会理瓦石田遗址曾出土红砂石戈范，其时代约在战国^{【153】}。而在东北及其邻近地区，石范却是石棺葬中常见的随葬物。在唐山雹神庙，曾发现过五件，计斧范一，刀范二，矛范三，均用辉长岩制成。赤峰红山后也发现过斧范^{【154】}。在辽阳二道河子^{【155】}、新金县安波公社^{【156】}的石棺葬以及凌源县三官甸青铜短剑墓^{【157】}中，均曾出土过滑石斧范。因此，石范的长期而普遍的使用，也应该视为这些边地民族的青铜文化特征之一。

在青铜器的器形方面，东北地区，华北长城沿线与西南地区之间的相似更加引人注意。其中国内外学者讨论得最多的，首推青铜动物形纹饰。

在我国辽宁西邮、冀北、内蒙古、宁夏沿长城一带，曾经出土过许多以各种动物为主题的饰物或纹饰，被学术界公认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遗留^{【158】}。但在西南一角，动物形纹饰亦颇盛行。如四川理县龙袍寨石棺葬中，即曾出土过鸟形饰^{【159】}，其形状与宁城南山根石椁墓所出十分接近^{【160】}

。在以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为代表的滇文化中，各种动物形饰物或纹饰更是以其生动多彩而闻名于世。特别是豹、虎等猛兽咬噬鹿、野猪的图像，野兽捕食牛、猪等家畜的图像，动物互相扭结格斗的图像，骑士战争或狩猎的图像等，均是北方草原文化常见的题材。如果说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滇文化的遗物多立体铸品，表现细腻，比例匀称，形象逼真，显示了更加娴熟的冶铸能力和更高的艺术水平。其中如晋宁石寨山所出之“四牛骑士盖虎耳细腰铜贮贝器”、“七牛锥顶形铜贮贝器”、“豹狼争鹿镂花铜饰物”、“二虎噬猪镂花铜饰物”、“虎牛搏斗镂花铜饰物”、“二豹噬猪镂花铜饰物”、“二虎噬牛镂花铜饰物”、“二兽噬鹿镂花铜饰物”、“三兽噬牛镂花铜饰物”、“一虎捕鹿镂花铜饰物”、“一虎背牛镂花铜饰物”、“三虎背牛镂花铜饰物”、“骑士猎猪镂花铜饰物”、“骑士猎鹿镂花铜饰物”、“一人三犬猎鹿镂花铜饰物”、“骑士镂花铜饰物”^{【161】}等，均是典型的产品，更不用说大量的单独铸造的牛头、孔雀、枭头，带有兔、鹿、鹰、鱼、蛇、凤的杖头饰，以及戈、矛、斧、钺、啄等兵器上的立雕动物装饰了。又如江川李家山墓地所出铜臂甲上线刻虎、豹、猪、鱼、蜂的图像，立鹿针线筒、立牛针线盒、立牛壶、双牛枕、虎牛案、二人猎鹿饰物、二人猎野猪饰物、一虎噬猪饰物、三狼噬羊饰物、鹿形扣饰、伏牛杖头饰^{【162】}等。还有一点不能忽视者，即滇文化中出土相当数量的长方形透雕铜饰物，其中或铸有动物，或铸有祀典场景，或有几何形花纹，其风格完全同于北方草原地区的青铜透雕带饰^{【163】}，不同之处仅在于滇文化的饰物多镶嵌绿松石、玛瑙或玉石，因而更加华丽而已。

除了动物纹饰以外，我们还可以从滇文化中观察到与东北地区青铜文化、特别是夏家店上层文化有联系的另外一些因素。如滇文化中常见的一种曲刃剑^{【164】}，在全国非常罕见，但在辽西、沈阳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棺葬、辽东地区于家上层文化的石棺墓、大石墓——石棚中，以及吉长地区的西团山文化的石棺葬中，均是常见之物^{【165】}。东北和西南所出曲刃剑其茎、格部分虽不相同，但其弯曲的刃部特征却相一致。滇文化中另有一种茎作人形的青铜剑，如石寨山之Ⅺ式剑^{【166】}及李家山之Ⅱ型三式剑^{【167】}、Ⅲ型一式剑^{【168】}，其作风亦不见于

中原地区，而在宁城南山根东区石椁墓中则有出土^{【169】}（图 7）。

滇文化中还有一种长骹曲刃矛，横剖面呈圆形的筩直贯前锋，在滇池类型^{【170】}及洱海类型^{【171】}墓葬中均有出土。但此类型的矛却见于吉林永吉星星哨水库^{【172】}，被称为“葫芦形矛”（图 8）。其余在吉林长蛇山遗址^{【173】}、辽宁清原县石棺墓^{【174】}亦有出土，唯形式略有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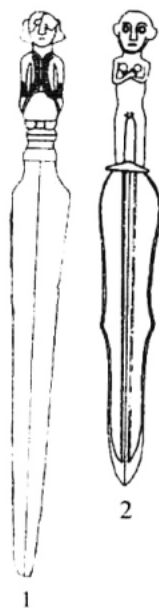


图7 人形茎青铜剑

1. 汪川李家山；2. 宁城南山根东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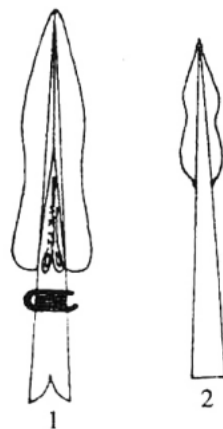


图8 曲刃矛

1. 祥云大波那；2. 永吉星星哨水库

关于滇文化中存在以动物纹饰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民族的因素，这一点早为国外学者所注意。如最早研究滇文化的美国学者哈斯金斯(J.F.Haskins)^{【175】}、西德学者德麦玲(Magdalene von Dewall)^{【176】}、日本学者白鸟芳郎^{【177】}等均曾论及此事，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看到这一边地文化传播带的存在，所以难于正确解释其来源。如奥地利学者海因·革尔登(R.von Heine Geldern)认为这种文化因素是从西方传来的，则是缺乏根据的假定^{【178】}。

从川西高原至滇西北横断山区，石棺葬的内涵与西北、内蒙古、东北的青铜文化相似之处更加显著。西南所出的双大耳罐与西北辛店、寺洼系统文化的双大耳罐形制相近，这一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图9)。最足异者，甘肃玉门“驸马”类型文化出土一种双耳罐，在与双耳成直角之颈肩之间有釜状乳钉，形制很奇特^{【179】}，但同类器物亦见于云南宁蒗大兴镇古墓群^{【180】}(图10)。德钦纳古所出茎首作双饼形的短剑^{【181】}，是长城以北战国时代最常见的一种形式，高滨秀《鄂尔多斯青铜短剑的型式分类》一文中FI式、FII式、GII式、GIII式均属此类^{【182】}。

(图 11)。另一柄青铜短剑茎部弯曲成两段，前段扁平，后段中空，断面呈枣形，上有线条形镂孔^{【183】}。这种形制奇特的剑绝不见于其他地区，仅河北昌平西周墓所出曲柄青铜匕首与之相似，唯后者中空之茎柄端为铜铃而已(图 12)^{【184】}。类似的剑，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还藏有一柄，高浜秀也是将它列入“鄂尔多斯”青铜剑范畴的^{【1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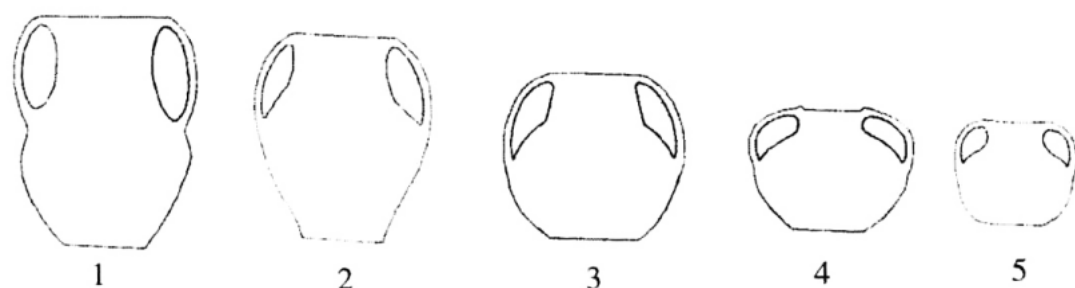


图 9 双大耳罐

1. 甘肃永靖张家嘴辛店文化；
2. 茂汶城关石棺葬；
3. 雅江石棺葬；
4. 巴塘石棺葬；
5. 德钦纳古石棺葬

宁蒗大兴墓葬中所出铜柄铁剑，剑首亦作双饼形，茎为镂孔纽辫状^{【185】}，其形制同于宁城南山根石椁墓 II 式刀^{【187】}(图 13)。此地所出之 I 式斧^{【188】}，则同于南山根一式 E 形斧^{【189】}。更令人寻味的是，四川茂汶营盘山石棺葬曾出土两柄青铜剑，茎、刃间一侧有扁平钩形格，剑首向两侧横出^{【190】}。此种剑在其他地区绝无渊源，但与南山根所出 III 式 C 形剑则有类似之处^{【191】}，所不同的是南山根的剑两侧均有钩形格，而营盘山的剑仅一侧有格。除此之外，夏家店上层文化石棺葬^{【192】}及北方草原文化常见之联珠纽饰，亦见于汶川萝葡寨^{【193】}、茂汶城关^{【194】}之石棺葬中。

就是在仿造中原铜器方面，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在个别器物上呈

2. 宁城南山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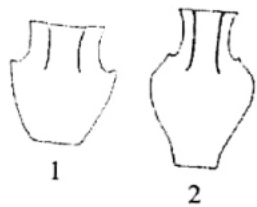


图10 带乳钉的双耳罐

1. 甘肃玉门;
2. 云南宁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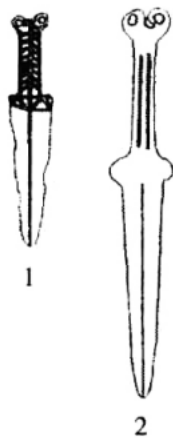


图11 双饼形茎首青铜剑

1. 德钦纳古;
2. 内蒙古和林格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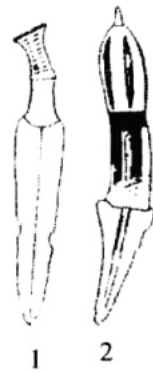


图12 曲茎剑

1. 德钦纳古;
2. 河北昌平

现出的相似性也是令人吃惊的。如 1959 年四川彭县竹瓦街曾出土两；罍，盖顶盘一立体蜥蜴状龙，肩部两耳之间饰象纹二，象纹之间饰牛首纹，腹部饰饕餮纹，圈足上饰夔纹一周^{【195】}，其作风与中原传统之罍有别。冯汉骥先生认为：这两件罍“形状和花纹虽大体上同于晚殷和早周的同类器皿，但骤视之则颇具有独特的地方风格，所以可以视为蜀土本地所铸。其样式和花纹虽取诸于当时的中原铜器，但组合意趣不同，故而显出地方的色彩”^{【196】}。但是即使是这样一种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的器物，在辽宁喀左县北洞村也曾发现，原报告定名为“龙凤纹罍”。编者认为：“此罍与四川彭县竹瓦街西周初年窖藏坑所出罍酷似”^{【197】}（图 14）。此种地方产的器物，居然从形状到装饰细部都能一致，当然绝非偶然，而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当我们探讨古代西南地区与东北地区的文化联系时，除了从器物类型(type)上加以观察以外，还可以从风格(style)上予以比较。这也就是说，两地同类器物虽然在形制上存在差异，但均具有某种共同的独特的作风。如陶器或铜器两体相连的风格，少见于黄河中下游或长江中下游的古文明传统中，但在本文所讨论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中，却是比较常见的。如昌都卡若遗址所出双体兽形罐^{【198】}、汉源大窑石棺葬所出单口双联罐^{【199】}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948000023067007006>